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 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刘曙光

内容提要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特色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内在逻辑要求。作为文化软实力,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真理性、规律性的探索,更代表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念、意志和利益,必须“有补于治道”。哲学社会科学必然体现国家主体性,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硬实力。哲学社会科学,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统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既体现“文明的冲突”,又体现文明的和谐与共同发展。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中国特色、创新动力上的人民主体性;要通过融通古今中外,凸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建构中国话语。要着力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论、主张、方案,展示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拓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国家主体性 民族性与世界性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100871

现阶段,我国普通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开设两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简称“两课”。要讲好这两门课,难度确实不小。如果照本宣科,不创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就难以引起学生兴趣。有的课堂上,虽然到课率高,但抬头率低,教师和学生“井水不犯河水”。教师在讲台上讲自己的,而学生则在台下做自己的事情。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亟须创新马克思主义教材体系、话语理论,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2018年8月13—20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招致一些人的诟病。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主题太中国化、太儒家化,对世界哲学的广度、深度会有减损。如有的学者指出:“在规范性这一点上,哲学的典范是西方哲学,而不是其他加字哲学,比如一定不是中国哲学。今年的世界哲学大会取名‘学做人’或‘学之为人’,一看就是出自搞中国哲学的人之手。这无疑

不是一个哲学的题目。或者,即使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哲学的题目,也可以随意的理解和谈论,直至远离哲学十万八千里。”^[1]毫无疑问,这一评价是以西方对哲学的理解为基础的。“学以成人”这一主题受到诟病,部分原因是:就连有的中国学者也没有弄清“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的含义,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中国概念的英文翻译本来就难以传神)。不过,从实质上说,这仍然是一个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力于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评价体系、期刊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知识体系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知识体系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信息流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由于话语权的劣势,中国注定还将在“骂声”中成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分析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探索构建知识体系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梳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具体科学在构建知识体系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实践,推出一批突显主体性、富于时代性、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进一步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2]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臻于成熟的产物。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3]:

1. “思想解放”开启的学科恢复和科研起步阶段(1978—1982)

这一阶段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开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换,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五年内实现了学科恢复与科研起步。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列为革命对象之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当其冲,高等文科教育遭到全盘否定,文科院校和文科专业停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处于停滞或中断状态,造成了文化灾难。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1980年5月,国家教委印发《加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见》,要求积极恢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管理等中断多年的学科,人口学、民族学、未来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薄弱和空白的学科也要认真创造条件,迎头赶上。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起步的重要标志有:一是科研经费从无到有,二是高校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积极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三是国家教委明确提出重点院校应建设成教学、科研“双中心”,四是高校社会科学专业、教师队伍和学位点基本得到恢复。

[1]王路:《我对哲学的理解——在世界哲学大会西哲联谊会上的发言》,2018年8月22日,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dphi/2944/20180822103736180674522/20180822103736180674522_.html。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3]关于“五阶段”的划分,详参张保生、朱盛文:《高校社会科学研究30年发展历程及其动力》,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复兴之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专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4—607页。

2. 基于“三个面向”开阔视野和转换视角阶段(1983—1991)

这一阶段的开启以1983年国庆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标志。“三个面向”直接针对教育,却蕴含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的发展方向,并决定了这一时期直至如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三个面向”是一体双翼的关系。面向现代化是“体”,是目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双翼”,是手段。换言之,面向世界和未来,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这一时期,“面向世界”主要是“面向西方世界”,对刚刚从文化沙漠中走出来的一代学人来说,苏联教科书已不能满足需要,西方学术文化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依托,对于中国知识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面向现代化,是“三个面向”的核心。现代化是社会整体大变革,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技术层面,而是必然延展到社会、政治、文化各个层面。因此,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

面向未来,主要是面向20世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向未来,要解决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体现现代化的超越性。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向西方学习,译介西方学术成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主要工作,西方的理论规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深刻影响了那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走向未来”丛书1984—1988年共出版60部,发行量极大。随着西方理论话语排山倒海而来,那一代学人对西方理论话语了然于胸,但是未来得及进行应有的反思。由于西方理论话语遮蔽了我们自身的理论传统和学术话语,那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理论话语认识不足,总结不够。

3. 面向主战场和突出应用阶段(1992—2000)

这一阶段的开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思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使人们从姓资姓社的禁锢中解放出来。1994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贯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全局,树立‘主战场’意识”,哲学社会科学只有面向主战场投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动力;在扶持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的同时,提出要发挥应用学科的优势,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推向市场。

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的成就有四个方面。一是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了“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奖,建立了奖励制度。二是1996年国家教委增列了支持“从校外有关部门获得经费资助的研究课题”专项任务项目。三是1997年教育部启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四是1999年教育部启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分三年滚动建设100个国家级水平的重点研究基地^[1]。

4. 文理并重和繁荣发展阶段(2001—2006)

这一阶段的开启以21世纪初江泽民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的三次重要讲话为标志^[2]。这三次讲话阐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其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

[1]参见张保生、朱盛文:《高校社会科学研究30年发展历程及其动力》,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复兴之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专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3—597页。

[2]21世纪初江泽民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的三次重要讲话,是指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上的讲话、2002年4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2002年7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这三次讲话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自然科学并重”。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是“以科研项目为基础,以重点研究基地为龙头,以科研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目标,以加强学术交流、资料信息网络建设和改进科研管理为手段,努力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2003年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深刻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

5. 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阶段(2007至今)

这一阶段是党的十七大开启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1]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紧跟着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步伐。“从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发展逻辑和历史进程看,不能不形成中国特色的东西,给世界历史打上中国的烙印。当代中国,就是要从人类文明成果中吸取营养,在总结中华文明历史遗产和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现代学术理论、观点、理念和话语体系,从而跻身于全球化多样性的现代世界文化学术舞台中心。”^[2]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受自身发展逻辑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需求的双重驱动。除此之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特征,科学技术的进步,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变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都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追问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可能直接关涉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哲学是什么?如果我们离开中国特色,纯粹以西方对于哲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理解作为评价标准,中国或许就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经典与历史。如果以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评价标准,中国不仅仅没有哲学,也可能没有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或其他的社会科学。

但是,如果我们认清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质或本质,或许我们会换一种角度来看问题,“知其大异者,进而求其更大之同”。事实上,并不是中国没有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或其他的社会科学,而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中国特色。正因为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有它特有的魅力、特有的价值。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

1. 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与特点

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真理性、规律性的探索,更代表了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价值观念、意志和利益。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为国家安全与稳定服务。中国文

[1]《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

[2]奚广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现代学术体系》,〔上海〕《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17日。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化的特色是：“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通过礼乐教化，人们就不会犯上作乱^[1]。如有的学者指出，社会科学是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可以通过国家的财富权力而拓展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共同价值。而话语权是通过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现实的历史叙事而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2]。在本质上，话语体系是特定国家思想理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政治原则、制度规范、价值取向的总体反映和实践运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渗透性^[3]。

一方面，话语权的取得与丧失，根源在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方面，话语权的强弱，既由话语主体或政权主体政治经济力量（硬实力）决定，也由主流话语体系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渗透力（软实力）决定。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4]。

特色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特色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必须有主体思想的自觉，需要主体根据主客体条件来加以引导、凝练和总结。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至少有几个：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体现国家主体性。国家在政治学意义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在经济学意义上是考察经济制度的重要切入点。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上层建筑，不仅体现国家核心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政权安全，而且要为国家制度提供论证或者辩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有过很多论述。西欧国家观念的兴起推动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形成。国家不仅是国际关系的主体，维护本国及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国家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国家具有自主性，即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管理社会，国家有可能通过对经济的调控而改变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可以通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改变资本逻辑的社会支配地位^[5]。国家主体性决定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文化软实力，取决于国家硬实力。亨廷顿指出：“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6]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正是应和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逻辑。正如习总书记所讲的，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不仅仅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要求，是政治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不能被西方学者把持，中国学者不能失去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主导权，不能让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冲击和左右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对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中国特色至少应该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国标准，中国话语，以习近

[1]这种礼乐教化作用，在《论语》中得到较充分的论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2]杨光斌：《有必要弄清“话语权”到底是什么》，《北京日报》2018年9月10日第16版。

[3]韩美群：《解构与重建：西方话语的理论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4]刘曙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何谓与何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周文、包炜杰：《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于西欧、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5期。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各项工作,等等。中国特色是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刻把握,是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之一。西方建构的是从个体主义出发并致力于维护资本权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而我们需要建构的是基于集体主义和人民主体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1]。

第三,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对立统一的。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规律,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不管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然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既有“文明的冲突”,又有文明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一种理论学说或一种模式,往往因为在认识上符合某一国家、民族的实际,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并被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而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因而它的普适性、真理性往往被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或民族放大,而其局限性、狭隘性、地域性则往往被忽略。强势文化很容易被那些处于弱势地位而又急于求成的国家、民族不加分析和批判地接受、认同并付诸实践,从而导致这些民族、国家理论上的盲目、盲从和实践中的困扰、困境。对中国而言,曾经的强势文化包括苏联模式、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等。实际上,中国的道路与苏联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既有联系、共性,又有区别、特殊性。理论如果不揭示共性,就不可能被学术共同体认同、接受。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被世界接受、认同,就在于它揭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生存状况。

2. 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性

不同于科学技术的无国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首先是个别的(地域性),然后才是一般的、普遍的、全球的。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社会工作,总是要先试点,再推广。

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人的类存在、类意识和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人具有类意识,人具有社会性。既然同是人类,那就必然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审美、共同的命运。人必然普遍地追求真、善、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人类社会也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包括共同的发展手段和目的。人类的一切学问,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都应当考虑“正德、利用、厚生”三个方面,即人的德性提升、社会的改良、民生的改善^[3]。

二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由此,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被卷到文明中来了,和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体。在经济交往扩大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政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

[1]杨光斌:《有必要弄清“话语权”到底是什么》,《北京日报》2018年9月10日第16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3]楼宇烈:《中华文化的人文特质》,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十辑2017年第2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

三是共通感的存在。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性或共同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存在时代性的共通感,在共时态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不仅仅是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世界性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家“并不是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2]。另一方面是因为存在文化共同体的或民族性的共通感,这是通过教化或“灌输”而使人们具有的共通感。这种共同感有时候是民族性的,有时候是地域性的,有时候是阶级性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分年龄层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总还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教化”的过程,就是通过人为的、目的性的干预与引导而达到某种共通感,人文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总体性的引导。如,中国的文化可以概括成“人文化成”,即通过礼乐的教化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社会的风俗。“人文”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质^[3]。

3.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是从有限的区域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概括总结出来的,而且,这种概括总结是有选择的,是对复杂的一种简化,因而,它得出的理论观点不可能是一把万能钥匙。马克思认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逻辑结论,由于它舍弃了不同的具体的历史过程的差别和细节,因而具有一定的“超历史的”、超时空的性质,这是它的长处。但是,它不会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相吻合,不能把它当作“万能钥匙”到处生搬硬套。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判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

第二,抽象出一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特殊。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生产,不能只满足于研究生产一般(生产在一切时代的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还要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特殊的、具体的生产。而且,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更为重要,“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区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5]。

资本主义有计划也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搞计划和市场。但是,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中,计划和市场是极不相同的。

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学,是从西方文化传统、政治发展道路和社会现实中概括总结出来的,“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文学”一词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

[3]楼宇烈:《中华文化的人文特质》,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十辑2017年第2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1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物”^[1],无法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万能钥匙”。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规律,……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况所共有的关系。”^[2]

第三,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认同现代化,并将它作为发展的目标。但是,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不是唯一的,不能掩盖、抹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走相同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等方面,并不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3]。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4]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国内外人士,错误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横加指责。如,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批评我们的政治体制;借口我国没有搞普选而否认我们是民主国家,甚至否认我国政府的合法性;以西方主流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是因为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

第四,语言、文化、价值等的民族性、地域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的特殊性。民族的划分基于历史、文化、语言等的差别,民族的概念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语言的真正差异不在于词汇的构造,而在于概念的构造,“因而学习外语往往是一种精神冒险,恰似一次探险旅行,最终我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革新语言同时意味着革新思想^[5]。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6]。

不同民族、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重视人,西方文化是科技文化,重视物。中国强调直觉智慧,西方强调理性智慧。中国强调实践创新,西方强调理论创新。中国强调内求诸己,西方是外求诸物。中国是存异互尊,西方是求同普世。中国讲中庸之道,西方讲绝对主义^[7]。

4. 学术创新及其话语表达

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强调经世致用,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更在于:服务现实,服务社会,发挥智库作用。一方面用现实升华理论,另一方面用理论照亮现实。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页。

[3][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页,第340-341页,第345页。

[5][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2页。

[7]楼宇烈:《中华文化的人文特质》,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十辑2017年第2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理论自信很重要,其实有自信还不够,还要有“他信”,即,他人相信。但现实的状况是:自信不足,能力不足,理论概括不足。如何使中国奇迹转化为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并让西方学术界接受、认同、信服?这就需要我们所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能融通中西、综合创新。例如,什么是哲学,这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学以成人”是典型的中国话语。中国的学者,不管是研究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如冯友兰、张世英、孙正聿、赵敦华、陈来等,一般会认为,哲学是以提高人生境界为主要任务。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功用是训练人成为完人,完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宇宙合一。”^[1]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成人之道”,探讨人生各种文化活动、各种人生境界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摸索一条可供参考的途径。“成人”指成为一个有高远境界之人^[2]。哲学既不能没有形而上的问题即纯哲学问题,也不能没有形而下的问题即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没有形而上只有形而下,哲学就会变成生活常识;可没有形而下,哲学就在天上,没有着陆点,永远与人的生活相分离^[3]。但是,西方哲学的功用是否也是“学以成人”,以及如何是,这就需要中国学者结合西方思想文化史加以阐释,并让西方学者信服^[4]。

话语权离不开学术上的创新以及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有了学术创新才能获得学术话语权。而学术上的创新,往往又是以新概念、新范式的提出为标志的。这种新概念、新范式凝聚了新观点,打开了新思路,并成为人们解释和理解某类现象的新方法和新话语。“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5]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对研究者的要求不可谓不苛刻:第一,必须学贯中西,既要有西学的基础,又要有国学的功底;第二,与西方学者或学术界有比较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切磋,能得到中西方学界的双重认可;第三,能根据中国历史文化的现实,提出具有理论概括性和现实解释力的新概念;第四,提出的新概念具有可沟通性、易于理解、便于传播,中西学者都能以此来交流。如,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的“新理学”是柏拉图主义、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理学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新理学提出的“真际”实际上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新实在论的“潜存”^[6]。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提出的“分散性宗教”等新概念,也都具有这样的品性。这种学术的创新,既融通中西、具有理论概括力,又具有现实解释力;既具有西方的理论理性,又具有中国的实践理性;既有普遍(间接、抽象)性的品格,又有特殊性(直接、形象)的品格;既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智慧,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因此,其才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比较广泛的认可。

有的学者把学术创新及其话语表达概括为四种类型:中国概念-中国事实(用中国文化、中国概念来概括、反映中国的社会事实)、通融概念-中国事实(以中国事实为基础,融通中西文化-结构相通之处,形成自己的概念)、拓展概念-中国事实(将国际学术界已有的概念、理论做拓展,来对照、解释中国的实际,做出新的概括,并进行国际交流)、外来概念-中国资料(用国外理论、概念解释中国事实和经

[1]《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58页。

[2]张世英:《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张世英先生把人生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审美境界”(求美境界)。

[3]陈先达:《马克思主义信仰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4]参见杜维明:《为什么要“学做人”》,〔北京〕《光明日报》2018年8月13日第15版;赵敦华:《学以成人的通释与新解》,〔北京〕《光明日报》2018年8月13日第15版。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6]张世英:《我的思想家园》,〔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验,或用中国事实、资料来验证外来理论),并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从完全中国的、经中西交叉的再到依附西方的连续统,而中西交叉的新研究更容易获得话语权^[1]。当然,这四种概括并不完全,还可以有中国概念-国际事物(全球问题、外国事实)。但关键是学术的创新。

三、创新中国特色的动力、源泉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从何而来?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1. 创新动力上的人民主体性,指导思想上的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以及创新的动力,与科学技术不同。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恩格斯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但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不能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否则,就会诱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急功近利、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从而扼杀了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党、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动力,承担起新时代传承和创新优秀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科学的创新是递进式的。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以后来的科学原理否定以前的科学成就。技术创新是取代性,有了新技术就不会再用旧技术,旧的生产工具免不了被淘汰的历史命运。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既不是递进式的也不是取代式的,而是基础累积式的。没有基础累积,就没有创新^[2]。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返本开新,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统一,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恒读恒新,具有永恒的魅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

2. 融通古今中外,凸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时,应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分宝贵、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养分。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者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焦点和难点。特别是近30年以来,随着“国学热”“儒学热”的持续升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中西文化交流扩大,三者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存在两种片面性观点:一是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失真”;二是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导致中国固有的文化命脉遭到压抑^[3]。近年来,由于认识的片面性,又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相互矛盾的。

要将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者的关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似乎也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

[1]王思斌:《积极促进我国社会学学术创新和话语能力建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陈先达:《史论拾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426页。

[3]陈卫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合流与变革的融合》,〔北京〕《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4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多方面资源在变革与融合中的综合创新。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来变革传统文化,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具有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复古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自觉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样,马克思主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才能获得认同感,具有亲和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作为精神命脉、体现民族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提供中国语言范式以及形式的支撑,又作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1]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这种继承和弘扬的根本途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包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突显主体性、富于时代性、具有原创性。这样的成果,在新时代,可以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时代主题的变换中改变着理论的生存样态,实现着理论创新,不断地出场走入当代。

当前,中华文明主体性问题尤为突出。“只有守住历史传统的根脉,才能打开面向世界的门窗。”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既要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要体现在吸纳、融合西方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严峻的:中国特色待完善,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凸显,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创新性成果稀缺,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没有正确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时以意识形态任意取代哲学社会科学,有时用中国特色抵制普遍价值,用本土化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等等。

特别是,在凸显中华文明主体性方面,由于学科分化、学科壁垒,学者多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第一,“学”难以贯中西,研究中国文化的不了解西方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的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学者难以融通中西,难以与西方学者对话,进行综合创新。第二,即使是在国内,学者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缺少对话的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西文化的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无从比较,无从创新。第三,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生活在“象牙之塔”。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使马克思主义空泛化、标签化,一些研究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学者则是“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第四,缺乏信达雅的翻译,中国成果难以走向世界,被西方学术界认同、接受。另外,我们的教育体制、评价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也存在弊端。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要以本国文化为主,决不能让西方文化反客为主或喧宾夺主。这样才能推出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则,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2]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3. 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中提炼中国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的浩大的社会工程,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需要不断地用实践和理论来检验。中国道路首先需要实践检验,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评判中国道路,应以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作为最终标准。同时,中国道路也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支撑、理论检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能“写境”、做写实家,又要能“造境”、做理想家;既反映现实,又要高于现实、超越现实。就像一个人有他的理想(思想)一样,一个国家也有它的理想。而且每个时代都有其国家理想,这些国家理想是与时俱进的,或者说,是越来越有深度的。抗日战争时期,争取民族独立、救亡图存是当时人们的历史理想(思想)。“历史思想是指一定时空条件、环境下的理想,指存在于一定理解方式下、方向下及特定影响力下的理念及理念范围。”^[1]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这是当下人们的历史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时,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四、拓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价值”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已由“世界走向中国”转换成了“中国走向世界”,或者说,以往是欧风美雨的“西学东渐”,现在转换成了“东学西渐”,那么,中国拿什么走向世界,或者说,中国拿什么“回馈”世界?这恐怕就要以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会贯通,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论、主张、方案,展示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1.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所选择的道路不仅仅是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也是人类文明形态发生新的变革后所选择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不仅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而且从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完善全球治理、探索人类更好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东方智慧^[3]。

2.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

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清醒的认识。冯友兰、张世英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支撑,这是其弱点。张世英把科学比喻为文化之躯体,把道德、审美等等比喻为文化之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的是一个强壮的科学躯体^[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依托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现

[1][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

[3]连广宇:《破解传统现代化困境的“中国方案”》,〔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

[4]张世英:《我的思想家园》,〔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弘扬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价值理念,是涵养中国价值观、人类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有学者指出,如果世界哲学大会需要一个口号,那应该是“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而“学以成人”是中西哲学史上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话题。成人意味着培育成熟的、完全的人格,成人的行动准则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1]。在当今世界,重科技、轻人文,重现实利益、轻理想、价值的观念泛滥,由此造成种种社会弊端。增强对学以成人的关注,是大有益处的^[2]。

3. 为世界治理和国际关系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在全球经济低迷、反全球化思潮有所滋长之时,中国开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药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些中国主张备受关注,中国已迈向影响国际发展理念和制度供给的新台阶^[3]。我们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胸怀世界,以东方智慧和全球视野,来观察与分析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矛盾与问题,使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治理和国际关系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倡导“重视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被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高频热词,正以其思想的高度和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响应和解读,并日益凸显其价值和重要性,不断发挥作用。这一思想也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给世界的一份宝贵财富。

4. 融合创新,回馈世界

中国文化曾经发展出独特的中国化佛教理论,推动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这是中国文化回馈世界的一个典范。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开辟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境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化发展,必将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去世前曾指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稳定的传统文化融(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4]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通过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对话,才能构建中国话语权,通古今之变,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汤一介先生在《瞩望新轴心时代》新书发布会的讲话,总结了他一生如何融通中西古今:“我都是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反观中国哲学中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问题是在我们怎么重新诠释,怎么让它能够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5]

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突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大体上遵循同样的方法和规律,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综合创新。概言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6]。

〔责任编辑:洪 峰〕

[1]赵敦华:《学以成人的通释与新解》,〔北京〕《光明日报》2018年8月13日第15版。

[2]张学智:《中国哲学视域下的学以成人》,〔北京〕《光明日报》2018年8月13日第15版。

[3]沈丁立:《中国理念正成为国际共识》,〔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5日。

[4]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2页。

[5]“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汤一介的发言”,2013年12月30日,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485367/>。

[6]《汤一介哲学(精华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03页。